

# 洛尔迦的诗

(西班牙) 洛尔迦 著

Seleccion de poemas – Federico Garcia Lorca



戴望舒 陈 实 译

名著名译诗丛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洛尔迦的诗

(西班牙) 洛尔迦 著

Selección de poemas - Federico García Lorca



戴望舒 陈 实 译

名著名译诗丛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 数据

洛尔迦的诗 / (西) 洛尔迦著 ; 戴望舒, 陈实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6  
(名著名译诗丛)  
ISBN 978-7-5360-6471-3

I. ①洛… II. ①洛… ②戴… ③陈… III. ①诗集—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552号

出版人：詹秀敏  
策划编辑：张瑛  
责任编辑：张瑛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杨亚丽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32 开  
印 张 8.625  
字 数 17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出版说明

周良沛

1



洛尔迦的诗

它是记忆中那遥远的遥远，却是不会忘却的永远永远。

这里应该说的，自然是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迦 (F. García Lorca, 1898—1936)，正是因为他，我却首先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 1904—1973)，这是一位在夜的阴沉中逃亡，“人们供给他兄弟般的信号灯”的诗人，是一位我“就是你们自己”的诗人，他的沉默是堡垒，对他“永不妥协”所降下的灾难，他又是刺穿一切压制的阻力在泥土里发芽的种子……

那已是半个多世纪之前吧，聂鲁达事隔 20 多年再次来到中国，却是初次来到新的共和国。有幸先读到为欢迎他所专译的《聂鲁达诗选》，之后又为他的到来认识了他。他那宽厚的肩背，难以数计其容量的胸襟，加以安达卢西亚人的深沉和亚拉冈尼亚人骄傲的面容，确有他那种海洋广阔、博大、汹涌诗情的容貌。至今，我还常听当代作曲家希欧都拉基 (Mikis Theodorakis) 选他的 *Canto general* (大陆先后有译为《诗歌总集》、《漫



歌集》的，陈实译为《全体的歌》）为词所谱的一大套中音独唱曲。作曲家是从希腊军政府监狱释放出来，移居巴黎的政治犯。那种拉美加以摇滚的曲风，唱得人热血沸腾。20世纪50年代，也有巴勃罗·聂鲁达自己吟诗的密纹唱片，诗词的激情与刚烈，同他柔和、悠然的声音，悠闲的姿态，以及他敲着桌面的肥长而白皙的手指，从容优雅的步伐之反差，竟然是那么大，仿佛只能从这种反差中读懂真正的聂鲁达。他讲到自己1935年任智利驻马德里的领事，过着生活优裕而懒散的外交官生活，写着他“紫色的丧钟”时，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马德里街头的鲜血，更有那一位写下的诗，从不在乎诗集出版的洛尔迦，带他到大学生中间去朗诵和演说他那诗的诗白——

你们会问：那么紫丁香在哪里？  
罂粟花蒙住的玄秘呢？  
那常常把你的诗，打出许多洞孔  
和疯话的雨呢？

我会把全部遭遇告诉你们。

.....

你们会问：为什么你的诗  
不讲梦，不讲树叶，  
不讲家乡的大火山？



来看满街的血吧，  
来看  
满街的血  
来看满街的  
血！

因为聂鲁达愿意和西班牙人民在一起，智利政府勒令他离开西班牙。1938年11月7日，为纪念马德里保卫战两周年，聂鲁达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在西班牙不寻常地出版了，书前的《献辞》道：“……加西亚·洛尔迦曾称他为卢本·达里奥后，美洲最杰出的诗人……”从《献词》可以看出，洛尔迦对聂鲁达的评价是很高的。虽然，两位诗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度，但诗，作为语言艺术的语言，他俩的母语都是西班牙语，有同文同语的文化的同根性，可是诗风迥异，人生和艺术的道路也不尽相同，却能彼此欣赏。他俩都很赞赏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当聂鲁达不恋“罂粟花蒙住的玄秘”后，雄浑、恢宏的诗情，热烈奔放于广博的诗境，正好与惠特曼式的诗形契合。洛尔迦不同，他无法，也无需改变即兴吟唱那种安达卢西亚的、歌谣式的歌唱所予以他诗的个性，并在自己民族、国度广泛传唱而穿透时空所留在诗史的声名，这已是无法变异的史实，但他从惠特曼所激昂了的，是更多的民主精神，如他在纽约写的《纽约》：



乘数式法下面，  
有一滴鸭子的血；  
加数式法下面，  
有一滴海胆的血；  
加数式法下面，  
一条温柔的血河；  
一条唱着歌流动的河，  
流经市郊的公共房屋，  
它是纽约虚假早晨的  
白银、水泥或微风。

诗无定法，意定法，惠特曼民主思想对洛尔迦的影响，似在那位歌唱谣曲的洛尔迦之外，又有另一个洛尔迦了。毫无疑问，无论讲诗，还是论人，这都是他一生之中很重要一页，但不是他的全部。他推崇的，是美洲那一时期体现了现代主义特征的诗人卢本·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可惜，至今还不见一本他的诗集之汉语译本出版。也许，他那虚幻的意境和悲观情调所营造艺术珍品的雅致难以翻译；也许，这位总以天鹅为美的象征而称之为“天鹅的诗人”的自身贫困，和笔下豪华的宫殿难以相融；也许，他自身的爱国与艺术上的逃避现实，与当代现实的距离并不为极少的西班牙语的人才所重视，才使大多西班牙语盲的读者失去直接从作品认识他的机会。然而，他在诗史上作为美洲那

个时代的现代主义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洛尔迦眼中卢本·达里奥之后的聂鲁达，其在诗史上的影响，已大大超过卢本·达里奥了。可是，这位聂鲁达，要讲他一生的辉煌时，是无法不讲洛尔迦对他的影响，由此，也可以想到，洛尔迦是怎样一位诗人了。

在西班牙人民眼里，洛尔迦不仅是位诗人，更是他们所热爱的剧作家。他的诗，对于不能直接从西班牙文阅读的读者，对于不能直接感悟到他的诗与他所描绘的吉卜赛人、安达卢西亚人的感情和喜忧之契合，此种阅读是很难到位的。施蛰存曾以《西班牙宪警谣》为例：

en la platinoche noche,  
que noche nochera.

洛尔迦式的语言之音调，运用文字声音的美所表达的意象之美，“中文就无能为力”，“只能聊以达意的分行散文”：

在这白金的黑夜里，  
黑夜遂被夜色染黑。

虽然读者于此阅读的遗憾，不能达到对它完全的感悟和理解，致以对诗人的认识也无法到位，但对它仍像在山野的清晨，呼吸到湿润的新鲜。若再去说些别的什么，



则多余、浅薄。它不像聂鲁达，尤其在看到马德里街头流的鲜血之后，不少诗都涉及社会生活和政治。但，诗人热爱生活的自由歌唱，直至今日的西班牙，都能看到孩子们在上学、回家的路上，都会很自然地吟唱、背诵洛尔迦的诗。它激发了新一代在他的诗篇、歌谣中，感受生活之美的光彩。这对佛朗哥独裁者的独裁，就是挑战、威胁，是庸俗社会学所认识不到的政治；独裁者的屠刀上所滴下洛尔迦的鲜血，所引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其反响之深，之广，不能不使这一独裁政权惊慌失措。一些以“热忱推崇”洛尔迦自居者，调动手下的御用文人为此大大作“秀”。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人民追究洛尔迦的死因、要捉拿凶手的抗议活动的持续之久，也是空前的，同时，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世界每个文化领域的文艺工作者的哀悼和愤怒之中的洛尔迦，他也更为人民所认识和敬重。这对时在欧洲，并懂西班牙语的戴望舒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他决定将洛尔迦的诗更系统地介绍给包括海外广大的华人华侨的汉语读者。

从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戴望舒汉译作品，如那认为源于东方诗体，又为流行的民歌形式之“深歌”（Cante jondo），或源于阿拉伯或波斯的，一般用于咏唱爱情的“小曲”（Casida），乃至歌唱斗牛师的长诗，或是相系这个民族的所特有的民风民俗的生活情趣之短章，如《海水谣》“在远方，/大海笑盈盈。/浪是牙齿，天是嘴唇。//不安的少女，你卖的是什么，/要把你

的乳房耸起？——先生，我卖的是/大海的水。……”它为广大民众所欢迎，是它深谙百姓的民族心理之艺术思维和审美情趣，但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政治烙印，独裁者佛朗哥可以不顺眼他，也不该视为他的统治首先应该除去的障碍，做他首个枪杀的文化人。对此的不甚理解，也好理解。记得 50 年前北京《诗刊》刊发过当时现场口译陈用仪先生记述聂鲁达对此的答问，半个世纪了，当时的资料一时也难找，但对聂鲁达为此非常简洁、有力的答问，仍有很深的印象。记得聂鲁达只说了那么一句话：

他表达了美，人的美好感情。

这一句话，对于当时虽然厌恶庸俗社会学图解政策和时事的文艺作品，却说不出什么道理的我，是非常强烈的震撼，是深度的感动。当然，不为时代的局限所局限者是不存在的，但它也为此让我自觉或不自觉地疏离当时创作的诗弊，可以相对地不陷得那么深，这也是为一生所铭记，永远都感激的。不过，此处所说的“美”，绝非现今仅仅时尚的风、花、雪、月，是对立于假、恶、丑的真、善、美的生命之树的一叶。是更深更广的人生靓色。一位诗人，能与人民的快乐与悲哀，愿望和理想一致。自然是“为人民写作”，自然在“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中为千百万普通人所熟知和热爱”。那股与人民对立的法西斯匪徒的反动势力，必然无法容得下他。



一位歌者如此的诗之历程所提供的诗的维他命，从某个角度看，其影响可能远远超过他某些具体作品的意义。一部几千年的诗史，他也不是此中的先行者和唯一的圣者，但他那痛斥独裁者的诗篇，也逼迫刽子手为自己掘好坟墓；洛尔迦遭长枪党枪杀所渗入乡土的血，又是他有别于他人的另一种人生，另一样的诗美。

后人为他美的诗、诗的美所滋养，也为他诗的美、美的诗矗立起诗的纪念碑。

一位同样如此于诗的中国诗人戴望舒，他 1933 年从巴黎到西班牙旅行时，虽然无缘认识洛尔迦，他要系统介绍洛尔迦的计划，一直是在格外重视、认真地进行。1948 年，好友施蛰存在上海遇问《洛尔迦诗钞》译得怎样，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两个民族，两种文化，各自的民族特性，首先是语言艺术的语言之强烈差异，译诗若能译得另一个民族用其母语同样能吟诵，不少学者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从这点来说，毋庸讳言，不同的习惯和想象力于诗的表达，有为不习惯于它的新鲜，同时也可能是感受、接受它的隔阂。但各自的文化特点，同样是各自的文化优势，是丰富民族精神的财富。只有那些有霸权欲的，才会以自我为中心而“一体化”于人，所被“一体”的，一旦失去自己文化的特性，必然是文化精神的沦亡，也是民族沦亡的前奏。

因此，对于距离我们传统审美趣味和习惯不一致的作品，既无文化称霸之心，则需要懂得对相异者的尊

重，才能相互欣赏。对洛尔迦其人和他的歌与大众融为一体的精神，我们的学习和借鉴，也不是单一的对它相异于我们的陌生、新鲜、新奇之简单、生硬的模仿，否则，亦是失去自我而以其为“一体”了。为此，这里译介的诗，亦非出于审美趣味的选择，重在对他于诗史地位的尊重，对他民族性的尊重。

译介这样的诗，难度很大。可是，望舒仍像愚公移山似的在移他的山。但在时局动荡、物价飞涨的生存压力下，很影响译事的进展。1949年他在香港，此事远未完成，为迎接新的共和国开国，他从香港绕道到了北平。此时，心情好了，生活安定了，可是，香港1941年沦陷后，他被日军抓进澳卑利街的“域多利拘留所”致残的身体，没有让他这么安定的生活几个月，便病逝北京。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十年动乱之后，我编辑出版了《戴望舒诗集》，修复了他在万安公墓被破坏的墓后，他女儿拿了一只藏有父亲残留之遗稿的小皮箱来，遗稿数量虽然不多，两只大信封也可以装完。但《灾难的岁月》之手稿却完好无缺，仅以有它，这只小皮箱也够珍贵了。里面有不少用“拍纸薄”上斯下的纸片，记有一些短句或零星的文字片断，根据我的那点知识，有些还能识辨它是推敲波德莱尔（C. Baudelaire, 1821—1867）诗译的短句。后来，听施蛰存讲，1956年他整理《洛尔迦诗钞》时，除了为其中缺少《诗人在纽约》这组诗，他原想译出其中的《给哈伦区的颂歌》、《惠特曼颂歌》，可是他总感到自己没有译



好，不愿出手。其他望舒原译的 32 首的译稿，有一些也是未能最后定稿的译笔，就像我看到的那些波德莱尔诗译的片断。最后能拿出那么一本书来，施垫存于其中所花的时间，所绞的脑汁是可想而知的。但译文的某些协韵的语调，也有明显不同于“雨巷诗人”的施垫存文笔之烙印。他没有署名，不为图名，无论是为洛尔迦，还是为望舒，它都该像聂鲁达所说的洛尔迦的作品“表达了美”，表达了“人的美好感情”那样，表达了他对友情之美。但是这部 1956 年出版的《洛尔迦诗钞》，在当时为华人，为汉语读者填补对洛尔迦了解的空白之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仅仅以这么三十几首诗介绍洛尔迦，又是远远不够的。然而，这三十几首译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还是为它印制了一本很薄又精美的小册子，它比许多大厚本的诗集，给予爱诗者的，有更深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在精神极度的饥渴中，为读一本想读的书，常常是“泡病假开夜车，精确瓜分阅读时间。”民间诗刊《今天》的代表诗人北岛说：“当《洛尔迦译诗钞》气喘吁吁经过我们手中，引起一阵激动。洛尔迦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含（孙康）的诗中响彻洛尔迦的回响；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80 年代初，我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迦的色彩。”这样一位诗人的三十几首译诗，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予以人们读诗的新的视觉，以及对诗新的认识，是则新的传奇。可是，仅仅以这三

十几首译诗来认识洛尔迦，也太不够了。此事，不是没有人想到，可是有条件能担负此任的，并不好找。可是，这多年来，陈实先生却一直默默无闻，持续不断，埋头苦译洛尔迦。

她是香港目前最为高寿的资深老作家，清新、隽秀的散文，无疑是香港散文的一位大家，也是望舒生前的友好之中，目前唯一的健在者。她对亡友的深情，仅从她始终不忘，一直设法寻找西班牙文的洛尔迦之原著，多少年来，陆陆续续，认认真真，持之以恒地做这么一件事，已足能说明这一切了。而且，这些译稿陆陆续续在香港译出，也陆陆续续输送到时在广州的黄新波手里。为什么这样，只有将来由陈实先生记述。版画家黄新波，抗战胜利后，他那贴近现实的作品，在他活跃的华南，尤为当时台湾和香港的读者所熟悉。今日的年轻人已不太知道他了，但历史会记住他的。他和陈实是胜利后以盟军中“英国军事代表团”属下“心理作战小组”成员先后从昆明复员到香港，创办了“人间书屋”和“人间画会”，是一位为兴旺香港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的文化人。他们情同手足。黄先生去世了，这回是由他女儿黄元找出译稿理顺、打印出来，以圆我们洛尔迦之梦的。今天有这本译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确实不易，又充满了人间情。若是完全从陈实先生的个人兴趣说，她非常钦佩洛尔迦的为人，并不是特别喜欢他的诗，施蛰存认为洛尔迦所无法译的地方，她认为正是洛尔迦拘于形式之弊。当人们为洛尔迦所以是洛尔迦，更多注视



他的光鲜之处时，陈实此说，也是可以尊重的一家之言。她更喜欢聂鲁达，她所选、译的一本《聂鲁达抒情诗选》，对过去的译本更多译自聂鲁达中期的 *Canto general*，忽视诗人早期和晚期有更多的变化、有更丰富的多样和复杂性的作品却注意得不够、不足，是一大补充。同样，这本《洛尔迦的诗》，其中的《诗人在纽约》，陈实先生补译了 16 首。

陈实与望舒的译笔各有其独特的个性，有不同的诗趣，这也为我们从它的丰富多样中读到诗质的一致。陈实所译的“洛尔迦”当是承接望舒译笔最好的。而且从数量看，陈实先生补译的诗远远超过望舒所译的《洛尔迦诗钞》。是个很不简单的工作量。她所以如此，不仅是兴趣和敬业，更是为了友谊，替亡友了却生前未能补的一大遗憾。她如此，自然和施蛰存一样，同样表达了他们的“美”和“人的美好感情”，绽放了他们各自心灵之美。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对于这么一本集诗人、译家之情而美于一炉的诗集，我们可以掂掂它美的分量，再说别的，已多余了。

2007 年 11 月 30 日香港北角初稿

2011 年 12 月二稿



# 译序

陈实

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迦只活到38岁，约20年的创作生活中，他给后世留下的作品，除戏剧外，只有6本诗集，不能说丰富。但作为诗人，他的国际名声却远比同时代的西班牙诗人响亮，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希梅内斯（1956）和梅尔洛（1977）在内。有人认为，因为他死于轰动国际的政治暗杀，造成他得享盛名，事实应该是反过来，因为他早享盛名，其悲惨的死亡才会轰动整个世界；而且他的作品确实有些特质是在别的西班牙诗歌里不多见的。

特点之一，是强烈的乡土气息。加西亚·洛尔迦的父亲是南方的地主，母亲受过良好教育，可以说是世家出身，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格拉纳达家乡度过，种地的农民和家里的仆人，甚至流浪的吉卜赛人，都带给他许多童谣和民歌，它们伴着他成长，成为他的一部分。据诗人的弟弟指出，《吉卜赛谣曲集》里那首《不贞之妇》，开头三行，就是某次远足旅行时从赶骡的脚



夫口里听来的，可是诗人记不起有这么一回事，骡夫的歌谣早已成为他的歌谣。

另一个例子是诗剧《血婚》里的《摇篮曲》，这也是一首民谣的艺术加工。民谣以幼儿口吻写成，勉强译成中文是：

摇呀摇，摇呀摇，  
摇小人儿的小摇篮，  
小人儿带马儿去河边，  
却不肯让马儿喝水……

他早期的作品并未怎样引起公众注意，诗剧《蝴蝶的邪术》受观众冷待，《诗篇》和《歌集》的读者，反应也不热烈，这种情形到了《吉卜赛谣曲集》出版之后就大大地改变了。

加西亚·洛尔迦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富于音乐性。他的诗用来吟诵，效果会比阅读更好，可以说，他的诗是为了吟诵而写的，他认为，通过有生命的媒体传达诗的信息，最能发挥“杜恩德”作用。所谓杜恩德，即西班牙文的 *duende*，直译成中文就是“魔力”，可是这个语词的含义太笼统，应该补充说明：它不仅仅是一种吸引力，它是有个人风格的、有创造性的、能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强烈共鸣的一种力量。诗人曾用两个例子作过具体说明。据说一位安达卢西亚的女歌手在一家酒馆里献唱，“她用阴郁的声音、用液体金属的声音、用裹